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在中共的历史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集中学习并不少,也涉及很多方面。那么,领导干部的集中学习主要有哪些内容?涉及哪些方面?

历史上,县处级以上干部都学些啥

学政经: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提倡县处级以上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9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他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

到了1959年6月2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召开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时说:现在,很多干部的头脑还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

济学。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一个小会,提出庐山会议讨论的题目。其中首先提出要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学历史:中外历史都要懂

刘少奇曾说过,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也曾号召全国所有县处级以上干部一定要学好历史。

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系统学习历史。他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和了解历史,包括学习和了解西方历史,只有了解了西方历史才能读懂马列主义,因为“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不到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讲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他指出,“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既要懂中国历史,又要懂世界历史,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学“四性”:工作再忙也一定要学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

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更是提出县处级以上干部都要学习“四性”。他说道:“干部们虽然工作繁忙,但这‘四性’一定要学、要培养。”

这“四性”是指: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毛泽东说邓小平,“外面柔和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这是对他原则性的高度赞扬;一位外国学者曾评价邓小平:“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系统性和预见性。(据人民网)

邓小平的“算账决策法”

善于“算账”,是邓小平决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他通过“算账”作出重大决策的最典型的例子,当数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

1978年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他总是要求参观所访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询问,计算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即到20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邓小平估计,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1000美元左右。为此,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一一算账。经过考

察和计算,邓小平感到人均1000美元可能难以达到,于是又作了调整,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

目标确定后,邓小平又开始计算能否按时实现。1983年,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他反复询问的问题是:到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

在不断完善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邓小平又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21世纪的发展目标。1987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又算了这样一笔账:到本世纪

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所希望的,我们恐怕还是在50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中国那时有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

邓小平的“算账”,是一种稳妥、慎重、科学的决策方法。正是通过不断地、精心地计算,他才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重大决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邓小平谈工作餐: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

1975年重新“出山”不久,邓小平便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58年11月初,邓小平在贵州视察工作,途中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向邓小平反映,重庆市城市人口比重较大,副食品供应紧张,劳动力尤其不

足。他提出:将江津地区管辖的巴县(现巴南区)、綦江和涪陵地区管辖的长寿三县划归重庆,扩大重庆的后勤供应基地。11月5日,邓小平决定到基层作些调查,听听基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贵州视察后,邓小平一行先到綦江,计划在綦江的赶水区和县城作短暂停留。下午6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到达綦江县城,到交通路的国营食堂吃晚饭。晚餐十分简朴,主菜是活水豆花和綦江地方小吃

——粉蒸羊肉(又称羊肉笼笼)。几位领导吃得很高兴,对粉蒸羊肉赞不绝口。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年访华细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据《北京日报》)

刘少奇:“借光”看书

刘少奇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家里的书读完以后,他就到附近藏书较多的村民家里借书来读。他自己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借到书后,就躲进房间里阅读。母亲发现后,十分心疼,怕他累坏了身体,每夜只给他半盏灯油。由于半盏灯油只能用一个半小时左右,晚上看书时间受到了限制。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借光读书”的办法。当时,家里的碾房请人碾米,经常要忙到半夜。每晚上半夜,刘少奇就去碾房看书,那半盏灯油留到下半夜才用。

周恩来:10岁种菜养家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养母陈氏也患肺结核病逝。那时,周恩来刚满10岁。周家本来经济状况就不好,加上给两位母亲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钱,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出入当铺。为了维持生活,周恩来还把自家花园改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

朱德:半桶水挑满缸

朱德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看到母亲天天忙个不停,朱德决定帮助分担家务。一天,天刚蒙蒙亮,朱德就偷偷地起了床,悄悄地担起水桶,一摇一晃地出门挑水去了。两桶水装满后,他使劲地用肩膀担,但他还小哇,终归没多少力气,水桶始终挑不起来。怎么办呢?朱德急得团团转。嗯,有了!每次只装两个半桶,多跑几趟不就好了吗?他试了试,行了!于是他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挑,直到水缸装满为止。

邓小平:“偷钱”助同学

邓小平小时候在北山小学堂上学期间,有过一次“偷钱”的经历。一天放学的路上,邓小平发现一位同学正哭得伤心,他询问原委。原来同学的妹妹重病在家,家里贫穷,无钱医治。怎么办?邓小平从家里“偷”了5个银元送给同学,嘱咐他快拿去给其妹妹治病。

邓小平家也不宽裕,而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500斤稻谷。不久,父亲便发现丢了钱,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当得知是小平所为时,把他打了一顿。(本报综合)